

中国经济发展的B面

——经济发展与
民族利益的整合



民族出版社

中国经济发展的 B 面

——经济发展与民族利益的整合

王文长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经济发展的B面/王文长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1996.12

ISBN 7—105—02593—X

I. 中… II. 王… III. 少数民族-民族经济-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IV. F12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6)第01158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14号 邮编100013)

民族出版社激光照排 孙史山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997年1月第1版 199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 $\frac{1}{2}$ 字数:160千字

印数:0001—1500册 定价:7.90元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历史基础:80 年代的区域经济比较	(7)
1-1 80 年代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	(7)
1-2 区域发展的两极及成因	(12)
1-3 区域发展的历史惯性	(23)
第二章 发展意识的觉醒	(28)
2-1 太平洋世纪的刺激	(28)
2-2 民族地区价值的重新确认	(31)
2-3 民族地区的自我觉醒	(36)
2-4 封闭与开放的两难	(39)
2-5 呼唤“倾斜”	(41)
第三章 经济布局与区域利益的构造	(44)
3-1 经济布局的自然选择	(44)
3-2 经济布局的分层	(49)
3-3 区域分异与封闭型资源配置	(56)
3-4 区域利益的构造	(60)
第四章 民族分布与利益分层	(63)
4-1 民族迁徙的历史走向	(63)
4-2 社区发育与利益分层	(65)
4-3 制度承诺与现实的反差	(68)
4-4 社区利益分层与民族分布的重叠	(71)
4-5 “民族—社区”多元利益的结构	(78)
第五章 多元化利益主体的运行	(86)
5-1 传统管理体制与“民族—社区”多元利益的矛盾	(87)
5-2 “民族—社区”多元利益主体的“诸侯经济”效应	(90)
5-3 “民族—社区”利益主体的双重角色	(93)

5-4	“民族-社区”多元利益主体的运行	(95)
5-5	现代企业进入古老社区的利益构造	(98)
第六章	经济伦理与利益规范	(113)
6-1	经济伦理的分歧	(113)
6-2	利益主体的摩擦	(119)
6-3	利益摩擦中的内耗	(124)
6-4	利益规范的方式	(126)
第七章	经济发展过程的价值判断	(130)
7-1	发展的价值	(130)
7-2	利益得失的结构	(133)
7-3	平等与差距	(137)
7-4	民族生存的环境利益	(139)
第八章	民族利益的整合	(151)
8-1	利益整合的本质	(151)
8-2	从现实到目标	(153)
8-3	利益整合的权变原则	(156)
8-4	利益整合的过程选择	(158)
8-5	多元一体利益基础的酝酿	(165)
第九章	走向市场	(168)
9-1	市场运行对资源配置方式的调整	(169)
9-2	资源市场配置下的利益预期	(172)
9-3	市场运行过程的利益协调	(177)
9-4	市场经济与民族自治制度的创新	(184)
第十章	世纪末的契机	(190)
10-1	“复”关的机遇	(190)
10-2	“借”关发展	(193)
10-3	超越常规	(194)
10-4	东方龙之梦	(202)
附录：一个封闭社区现代化过程的双重人格		(204)
后记		(231)

导 言

伴随着新世纪的来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重点的向西部转移正逐渐提到现实日程上来。中国西部由冷变热,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格外引人瞩目。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并非新问题,对民族地区经济研究也已获得重大成就。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尤其是确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市场化道路之后,围绕市场所建立的资源配置关系、区域经济利益关系等,事实上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长期的计划化所形成的对市场经济的陌生感和被动性,加深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的困惑。民族地区怎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自由驰骋?新的经济发展环境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什么机会?市场对资源配置关系和区域利益关系的调整将对民族利益的结构变动带来何种影响?

在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的今天,如同欧美国家不能无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经济不能不走向世界市场一样,每一个关心中华民族命运的中国人以及关心中国经济发展的各国友人,都不应该漠视占中国国土面积近三分之二的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应该忽略中华民族这一多民族共同体赖以凝聚、协调、发展的经济利益基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多民族共同体,其经济利益基础的构造,既是共同体存在的前提,也是共同体发展的需要。多民族共同体经济利益基础的构造,有赖于各民族、各区域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利益关系的协调,局部利益的趋向相融和整体化。那么,当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踏上市场之路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经济利益基础的构造是否面临着新的挑战呢?

世纪末日益躁动的民族情绪，使两德统一，使苏联变为独联体，使世界的地图商们无所适从。每一个多民族国家都不敢轻视世纪末的这一变化。因此，加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经济利益基础的构造便愈益重要！

每一个目睹了本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人，都会为之欢欣鼓舞的。改革、开放、发展等概念，无疑是大众传媒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术语。一股孕育已久的经济发展热情借改革开放的春风席卷古老的中国大地。迅速崛起的新兴经济区、新兴城镇以及日新月异的摩天楼群等，无不在向世界昭示：未来属于东方！

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如北京市人、上海市人、广州市人、深圳市人等，或者生活在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如苏南人、温州人、窦店村人、大邱庄人等等，在劳作之余、酒足饭饱之后尽情享受现代生活的舒适之时，也许会情不自禁地追忆起多难的往昔，但是否会联想到城外、村外的另一番天地的民族同胞的生活状态呢？

是的，现代商品经济的响箭已经穿越阿尔卑斯山，穿越落基山，穿越富士山，穿越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回响着多么激动人心的鸣镝！深居于中国腹地的各民族同胞在 40 多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程中，逐渐抛弃了旧经济关系和自然经济的桎梏，民族地区的现代商品经济逐渐得以成长。然而新的经济基础仍很脆弱，经济制度的大跨度超越潜伏着种种矛盾。自然环境所构筑的障碍仍在困惑着期望加快经济发展的边远地区人民。商品市场的竞争法则、资源配置的效率原则，就像强烈的太阳光一样令经济发展滞后的民族地区感到不适和眩目。

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现实。在一种封闭的生活方式中，人们有理由自我封闭地面对现实；而在一种已经开放了的生活方式中，人们便需要摆脱自我封闭，面向更广阔的生活空间，不仅考虑自己的利益实现，而且还需要考虑到在形成自身利益过程中的他人利益。我们不能忽略中国辽阔的国土环境、生产条件的巨大差异和经济发

展不平衡状态对构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经济利益基础的影响。

当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人们抬脚踏进小康之家的门槛时，别忘了还有跋涉在温饱路上的同胞。在民族地区的古老村庄，在寺庙、经堂、金顶、经幡和村头路边的玛尼堆，寄托着我们同胞一颗颗善良和渴望幸福的心。苦修来世，交织着多么复杂的心情。正在过着富裕日子的人们，难道不应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多一些同情心和责任感吗？

相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经济不发达地区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的状态使该地区的政府和居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发展的危机感。差距扩大，作为东西部地区之间或民族地区同一般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态势比较的概括，其内涵已经用不着多花笔墨详加解释。从学术殿堂到政府机关，每一个关注中国西部地区、关注民族地区的有识之士，都不会对上述两类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说法感到陌生。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国民经济发展统计指标常常被据为上述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佐证。

一方面，经济发展在推动着社会进步；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又在映衬出某些社区的落后。对于后者，发展景观在作了“马太效应”的解释之后，进一步的形容差不多便是“越发展越落后”了。在大家都处于同样饥寒交迫的情况下，相互之间没有贫富差别，自然也无所谓谁先进，谁落后；而如果有谁首先改善了生活条件，生活质量的差别出现，相对于先行一步，便有了落后。这种相对贫困的道理已经尽人皆知。但尽管“均贫富”带有明显的空想色彩，平均主义者人皆否定，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差距和某些社区的相对贫困状态却令人难以接受。尤其当这种差距不仅具有相对性，而且被描述为绝对性时，处于落后社区的居民的心态反响更是可想而知。

经历了40多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国的东、西部地区共同从沉寂、封闭走向改革开放，在沉寂、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共同处

于缺乏发展的相对均衡,改革开放打破了社会生活的沉寂和封闭,也打破了共同缺乏发展的相对均衡状态。这段振奋人心的历史进程在为西部,尤其是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带来生机的同时,也为东部沿海地区创造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从而使中国经济发展形成两个鲜明的层面:A面是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工商业发展迅速,新型城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商品经济、社会发育较快,社会进入一种开放态;B面是边山穷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育滞后,商品经济不发达,多数社区仍滞留于自然经济社会的封闭态中。一种社会制度,两种发展状态。人们可以找出一千条一万条理由来解释这种状态的难以避免性,但理由无法消弥两个层面的心理不平衡。

经济指标不仅可以使一些理由变得量化,可以说明经济发展滞后社区的居民生活质量仍有巨大改善,可以说明落后是相对的,差距扩大是相对于基数水平和绝对量增长惯性的,而且也可以由量的差别引导出感情变化。尤其是40多年的社会主义大锅饭生活方式的熏陶,当B面的居民猛然发觉自身的生活同A面居民生活质量的巨大反差时,即使有许多理由来说明这种反差必须归结于历史基础,即使现实的经济发展指标可以说明收入水平的差距扩大仅仅是相对的,但这种差距状态也已足够对B面的居民心态造成深刻影响。况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名正言顺地承认效率对资源配置的重要性和市场竞争的必要性。A面和B面,这两个经济发展层面事实上再一次面临着经济发展过程的伦理冲突。市场竞争所突出的效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构成了对留有均等痕迹的传统公平观念的有力冲击。

平心而论,市场经济为处于中国经济发展B面的民族地区提供的是一个喜忧参半的经济竞争环境。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术语能够成为时髦,的确与其概括的生动性不无关系。把压力化为动力,可以说得娓娓动听,而付诸实践却是惊心动魄。挑战既是动力,也是压力。机遇的存在和获得并成为经济发展的现实因素又是两回

事。对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充满信心和饱含激情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沉着冷静地迎接市场竞争和效率原则的挑战,把机遇转化为经济发展的现实因素。

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迎接挑战和把握机遇,不可能是在一种封闭状态中追求单向度的自我发展,而只能是在一种开放状态的双向度协同发展过程中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即在A面和B面的协同发展中实现B面的发展目标,在促进全国的整体发展,加强民族地区同汉族地区的经济联合中,实现民族地区的发展目标。在这种开放状态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所涉及的经济利益关系,实际上也就是协同发展和民族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这一关系客观上构成了新时期市场经济环境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础。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竞争精神必须倡导,效率原则必须坚持,但竞争和效率原则的运用应有利于各民族之间利益关系的调适。从中华民族发展繁荣的历史趋势着眼,强化各民族利益关系的一体化基础势在必行。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利益凝聚力是各民族所共同需要的,正确协调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是实现民族团结的基本前提。

* * * *

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事实上已经形成差别显著的发展层次,涵盖了:1、以海南省南部地区为代表的包括桂东南及其他沿海少数民族杂散区的东部沿海开放层次;2、以瑞丽、畹町、满洲里等内陆沿边开放口岸为代表的沿边开放层次;3、以内陆大中城镇为中心的区域极点增长层次;4、内陆乡村发展层次。本书关于民族地区的概念表达,侧重于反映第四层次类型的地区。

本书分析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在使用“区域”概念的同时,也根据不同空间结构的需要使用“社区”概念。因为“社区”比之“区

域”在表达人们共同生活的一定区域方面更具丰富的人文地理内涵。它指聚居在一起的以一定生产关系为基础而组织起来的人口集体,并赖以进行生产和生活活动的、有一定地界的地理区域;居民之间不仅具有基于血缘纽带的共同成员感,而且具有同类意识,表现出牢固的内聚的相互作用,并为谋求成员的相互协调而形成一定的社会规范、行为准则和社会群体及机构。社区概念比区域概念更能生动具体地反映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特点。

第一章 历史基础： 80 年代的区域经济比较

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在 80 年代以前的约 30 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实质性的飞跃和变化却是伴随 80 年代的改革开放进程才发生的。80 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开了大江南、北经济发展的繁花,塑造了中国经济建设的新形象。这并不是否定此前的经济发展基础的存在和作用。实际上,80 年代的经济的发展正是在此前的社会基础之上演变的,而且由于 80 年代的改革开放实施了对微观机制的放权搞活,扩大了地方经济发展的自主权,在各个区域之间所展开的经济发展竞争过程中,历史基础的作用便更加明显,不可避免地影响着 80 年代的经济的发展过程,形成一定的历史发展惯性,并继续影响着以后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

1—1 80 年代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

为了具有可比性,本节对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统计分析,略去京、津、沪三市及海南省,原因是京、津、沪三市基本属于都市经济,与其他地区之间存在许多不可比因素;海南则是在 80 年代末才刚刚从广东省分离出来,单独建省,缺乏统计比较基础。其他区域的比较以典型区域为主。

纵观 80 年代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其区域经济格局

有三个基本特点：

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地带特征显著

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史所遗留的是一种生产力布局极不平衡的空间结构，现代工业主要集结在东部沿海城市，相应来说东部沿海地区的商品经济也比内陆地区活跃、繁荣得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在生产力布局上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增加了对内陆地区的资金、技术、人力、物力等生产要素的投入。1949—1980年，工业总产值的年增长速度全国平均为13.16%，甘肃、宁夏、青海为15.3~17.59%，内蒙古、山西为14.44~16.21%，河南、湖北、湖南为14.41~16.20%，而东部沿海的上海、江苏、天津、辽宁、广东等省市则分别为11~13.4%^①。内陆地区特别是西北、西南地区的经济增长，使旧中国的生产力布局有了明显改善。

在历史的指针拨向80年代之际，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搞活增强了地方经济发展的自主权和灵活性，同时也赋予不同区域经济发展以新的分工和责任，各地区经济在都获得发展的情况下，又逐渐形成了新的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和地带特征。以1982年与1989年两个典型年份各省区人均工农业产值的排列次序为例（见表一）。

如果说1982年按人均工农业产值的次序排列各省区之间的地带特征还比较模糊的话，则1989年的地带特征已渐趋清晰。从表一两个年度的对比可以看出，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均工农业产值迅速增加，广东、山东、福建在各省区的排列次序中已从原来的第9、7、16位跃居为第4、5、9位，渤海经济圈及江浙、闽粤经济带在全国区域经济格局中的优势地位已经基本形成；西南地区及广西仍然处于落后状态；其他省区除了吉林、黑龙江及湖北凭借历史基础仍保持比较靠前的名次外，基本属于中等状态，相互之间差距较小。地带分布呈现出近似T型的状态，展现了极有趣的特征，即中

1982年与1989年各省、区发展比较 表一

1982年部分省区 人均工农业产值(元)			1989年部分省区 人均工农业产值(元)		
人均工农业 产值以 1000元 上	辽 宁	1577.56	人均工农业 产值以 3000元 上	江 苏	4635.40
	江 苏	1210.76		辽 宁	4564.50
	黑 龙 江	1109.75		浙 江	3901.38
人均工农业 产值在 700-999.99 元之间	浙 江	938.58	人均工农业 产值在 2000-2999.99 元之间	广 东	3644.48
	吉 林	906.11		山 东	3025.98
	湖 北	853.45		吉 林	2764.04
	山 东	791.97		黑 龙 江	2754.99
	山 西	774.08		湖 北	2494.58
	广 东	719.24		福 建	2413.33
	河 北	681.93		河 北	2266.79
人均工农业 产值在 500-699.99 元之间	新 疆	633.05	人均工农业 产值在 1500-1999.99 元之间	新 疆	2124.48
	湖 南	622.43		山 西	2121.37
	陕 西	606.82		安 徽	1772.17
	内 蒙 古	604.28		宁 夏	1756.04
	青 海	582.70		陕 西	1737.70
	福 建	576.00		内 蒙 古	1736.10
	甘 肃	570.94		青 海	1722.73
	宁 夏	556.74		河 南	1705.14
	江 西	550.45		湖 南	1693.46
	安 徽	538.50		江 西	1634.91
	四 川	533.46		四 川	1564.54
	河 南	514.14		甘 肃	1553.41
	广 西	471.85	人均工农业 产值足 1500元	广 西	1298.96
人均工农业 产值足 500元	云 南	441.49		云 南	1254.39
	西 藏	392.59		贵 州	1057.43
	贵 州	354.40		西 藏	763.89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1990年。

等水平的省区分布为 T 型,在 T 型的左右下端分别是经济发展最发达的和最落后的两极。

二、发展势差强化

我国 80 年代所实施的经济政策在进行区域经济发展动员的同时,客观上促使了原来经济社会发育比较完善、经济基础及发展条件较为优越的地区,经济获得了优先发展;而一些原来基础较差、环境比较恶劣、经济社会发育滞后的地区,则继续处于落后状态。二者之间的发展差距呈扩大趋势。以贵州与辽宁两省为例,1982 年辽宁与贵州两省的人均工农业产值分别为 1577.56 元和 354.40 元,差距指数(注: A 与 B 的差距指数 = $\frac{A}{B} - 1$,这一指标从相对数的角度反映 A 与 B 之间的差距倍数)为 3.45,绝对差额为 1223.16 元;1989 年两省的人均工农业产值分别上升为 4564.50 元和 1057.43 元,差距指数虽然降为 3.32,但绝对差额却增加到了 3507.07 元。这一组数据表明,1982 年至 1989 年间辽宁、贵州两省的人均工农业产值年增长速度相近,甚至贵州比辽宁稍快些,但由于基数比悬殊,实际显示的绝对差距反而扩大。而如果将贵州与发展速度较快的江苏、广东等省比较,情况又有所不同,不仅二者之间绝对差距拉大,而且差距指数也扩大。如江苏与贵州两省人均工农业产值的差距指数 1982 年为 2.42,1989 年则增加为 3.38;广东与贵州两省人均工农业产值的差距指数 1982 年为 1.03,1989 年为 2.45。

发展势差强化不仅存在于个别省区之间,而且也表现出地带性。以辽宁、河北、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广东等省组成的东部沿海地带与云南、贵州、四川、西藏及广西等省区组成的西南地区之间的对比为例(见表二):

1982—1989 年部分省区

人均工农业产值增长倍数 表二

东部沿海地带	辽宁	河北	山东	江苏	浙江	福建	广东
增长倍数	1.89	2.32	2.82	2.83	3.16	3.19	4.07
西南地区	云南	贵州	四川	西藏	广西		
增长倍数	1.84	1.98	1.93	0.95	1.75		

资料来源：根据表一核算。

从表二可以看出，东部沿海地带人均工农业产值的增长速度除辽宁省略缓于贵州、四川外，其他地区的增长速度都快于西南地区。东部沿海地区以较大的基数乘以较快的发展速度，西南地区却以较小的基数乘以相对低的速度，这种态势使得两类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无论在绝对意义或相对意义上的差距都有增无减。T型地带的省区其发展态势基本上介于以上两极之间，仍然维持着中间状态，但省区之间，尤其是与辽宁、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之间的绝对差距也在拉大。

三、区域利益主体突出

伴随经济体制改革所发生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经济管理权益的重新调整，扩大了地方经济发展的自主权，原先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开始松动并逐渐分解为以各省区为主体的分区管理格局，省区之间获得了各展所长并各据需要进行区域协作的权利。各省区虽仍实行统一的经济管理制度和利益分配原则，但幅员辽阔和地方分权管理的要求及现实，使得利益的形成和分配不可能脱离具体区域的经济的发展，行业的发展及利益实现同样表现为区域内的行业利益。居民的收益及生活质量与区域利益的形成和分配状况直接相关，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之间居民生活质量差

别悬殊,前者比后者要优越许多,其中原因既有个人劳动的直接报酬,也有区域经济整体利益的形成及再分配所产生的影响。

区域利益形成及分配的相对独立性并对各具体区域居民收益的直接影响客观上也强化了区域利益内凝外斥的区域局部利益观,并引发了区域市场之间的相互封锁和羊毛、棉花、蚕茧等商品战,以及区域投资欲望的膨胀。各省区各自制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既反映了各自的区域经济发展的意志,也反映了区域的利益愿望。与行政区划相联系的地区之间的经济封锁,并悄悄酝酿的“诸侯经济”,突出地表现了区域经济利益形成的多元状态和区域利益主体的相对独立性。

甚至区域之间的经济协作也出现了同类相聚以增强对外抗衡能力的现象,如1984年成立的由四川、云南、贵州、广西、西藏、重庆市组成的西南五省区六方经济协调会,由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组成的西北五省区经济技术协作联席会,1985年成立的中原地区经济技术协调会,1986年成立的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席会议,1987年成立的武汉经济协作区等,都是以共同或相近的利益为基础的,而且协作较为松散,在项目协作的同时继续维持着区域利益的相对完整性。

1—2 区域发展的两极及成因

80年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带特征和发展势差形成了区域间发展与滞后对比鲜明的两极:即迅速发展的东部沿海地区与发展滞后的西南地区。

三种发展类型

辽宁、江苏、浙江、广东是80年代我国也是东部沿海地区四颗